

家庭與學校依附脈絡因子對台灣青少年 憂鬱症狀發展之縱貫研究

劉宗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江守峻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學位學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國三至高二憂鬱症狀的長期發展變化，並釐清不同依附關係（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學校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研究對象為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中 2002 年國中三年級青少年，並持續追縱之後兩年的憂鬱症狀發展情形。資料分析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式為主。

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起始值和成長變化情形存在個別差異。其次，國三時憂鬱症狀程度較高的青少年，整體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慢；而國三時憂鬱症狀程度較低的青少年，隨後時間內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快。最後，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在高一時急遽成長，持續上升至高二。在依附關係上，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對青少年憂鬱症狀較具影響力，同時影響憂鬱症狀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而父親依附只影響憂鬱症狀起始狀態、母親依附則對憂鬱症狀沒有顯著影響。基於研究結果，本研究對教育工作和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依附；潛在成長模式；憂鬱

緒論

關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縱貫研究，外國已累積相當多資料（Agerup, Lydersen, Wallander, & Sund, 2015; Boutelle, Eisenberg, Gregory, & Neumark-Sztainer, 2009; Branje,

* 通訊作者：劉宗幸（csluwww@mail.nknu.edu.tw）

Hale, Frijns, & Meeus, 2010; Brière, Pascal, Dupere, & Janosz, 2013)，但台灣仍多半以橫斷研究來了解青少年憂鬱症狀或其帶來的行為影響，例如偏差行為、人際困難、課業影響、親子問題等（王齡竟、陳毓文，2010；黃昱得，2014；Oldfield, Humphrey, & Hebron, 2016）。但這類研究的限制在於無法從縱貫的角度看到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長期發展。

目前，少數學者調查憂鬱症狀的長期發展趨勢（吳中勤，2015）、憂鬱症狀與偏差行為的關係（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檳，2017），以及相關保護或危險因子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關係，例如父母親的嚴厲教養、低親子關係、自尊等（吳齊殷、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進一步來說，黃鈺婷（2011）發現學校依附對憂鬱沒有顯著影響，但同儕關係對憂鬱的長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吳齊殷、黃鈺婷（2010）則指出低親子關係滿意度會令青少年憂鬱情況逐漸攀升。上述研究顯示，目前尚沒有針對不同依附關係對憂鬱症狀長期發展變化影響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嘗試以這樣的角度探討青少年時期的支持系統（包括父母、同儕和學校環境）對青少年不同時期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程度，期望以宏觀角度提供助人工作者、教育單位和相關決策者更多資訊，以擬定適切的青少年憂鬱症狀介入和處遇策略。

青少年憂鬱一直是令人關注的議題，主要原因在於青少年時期對心理疾病的易感程度高於成人時期；研究亦證實青少年時期是許多心理疾病的第一次發作期，而且青少年時期即出現心理疾病者，不論是在學業、工作、人際或生活品質上，疾病對將來的影響程度愈大（Wickrama, Conger, Lorenz, & Jung, 2008）。雖然如此，青少年憂鬱症狀卻很容易被忽略，主要跟青少年特有的生理發展特徵有關，包括情緒起伏和衝動行為易使周遭的人誤將其憂鬱症狀視為青少年尋常的情緒表現；長期忽略的結果可能使憂鬱症狀惡化，影響到成人時期的各個生活層面。因此，從預防角度來看，若父母、老師及心理專業人員能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更多了解，釐清保護及危險因子對不同時期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程度，愈有可能協助憂鬱的青少年度過困境，不致走向父母、學校、同儕和整個社會面臨青少年因憂鬱而自殺的無助情況。

關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保護因子，可分為生理遺傳和環境因素，其中環境因素又可分為家庭及學校環境兩大因素，前者主要是指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而後者則包括同儕關係和學校支持。青少年階段是發展獨立自主的重要時期，與父母及同儕關係的品質更是青少年發展獨立自主的重要支持來源。亦即是說，青少年一方面在人際關係中學習自我肯定、發展自主性，另一方面學習在表達自我時仍能與父母及同儕維持良好親密的人際關係（Kobak & Ferenz-Gillies, 1995; Kobak, Sudler, & Gamble, 1991）。當這兩種關係出現問題，青少年的發展受到干擾，憂鬱症狀就容易產生（Coyne, 1976）。隨着青少年成長，學校因素對青少年的影響力較以往大，因此青少年是否感覺獲得學校支持，對學校有認同和歸屬感，進而對學校有情感連結的依附關係，亦

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重要因素（Kuperminc, Leadbeater, & Blatt, 2001; Loukas & Robinson, 2004）。

綜合上述，本研究嘗試以縱貫角度來了解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趨勢，同時釐清在憂鬱症狀發展過程中，父母、同儕和學校與青少年不同時期憂鬱症狀程度的關聯。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二：

1. 了解青少年從國中三年級（下稱國三；國一、國二同此理）至高中二年級（下稱高二；高一、高三同此理）憂鬱症狀的長期發展變化為何？
2. 了解青少年在不同時間點（國三逐年至高二）的憂鬱症狀與對應的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的關聯為何？

文獻探討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特徵和長期發展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特徵

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涵蓋諸多面向，對個體發展有重要影響。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五版，憂鬱症診斷標準包括沮喪心情或是原本有興趣的事物變得沒有興趣、食慾和睡眠改變、自我感低落、易有罪惡感、記憶及專注力下降，甚至出現自殺念頭。當青少年出現憂鬱症狀，亦會出現上述症狀，但其表徵有特殊性，可從認知、情緒和行為三方面談。在認知上，青少年有一定成熟程度，因此較兒童更有能力描述內在狀態，對無望感、罪惡感、自我批評這類想法更能正確表達。在情緒上，青少年感知度強，情緒起伏較成人快速且短暫，因此出現憂鬱情緒時，容易被誤解成過度敏感。自從 Hall（1904）提出青少年處於風暴期，一般大眾對青少年的認知都停留在情緒起伏大、易衝動，對青少年的憂鬱情緒表現易歸因為正常表現，忽略了憂鬱的可能性，導致太晚介入而發生青少年自殺的悲劇（Davaasambuu, Phillip, Ravindran, & Szatmari, 2019）。

另外，研究顯示，青少年時期的憂鬱症狀表現亦可能是其他心理疾病造成，因此青少年出現脾氣暴躁、失眠等行為時，可能是憂鬱症狀，又可能是其他心理疾病的症狀，因此謹慎分別這些症狀有助及早給予青少年適當協助（Harrington, 2004）。

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發展

調查發現，愈早出現憂鬱症狀的青少年，一年後仍有相當高的憂鬱情緒，更可能

延續至成年時期 (Ssegonja et al., 2019)。長期追蹤亦發現，青少年時期出現憂鬱，即使只是輕微症狀，平均約有 30–45% 在成人時期出現憂鬱症狀 (Cohen, Cohen, & Brook, 1993)。這些研究說明了憂鬱是長期的慢性病，個體若在青少年時期出現憂鬱症狀，復發的機率遠高於青少年時期沒有憂鬱症狀的人 (Hill, Pettit, Lewinsohn, Seeley, & Klein, 2014; Musliner, Munk-Olsen, Eaton, & Zandi, 2016)。

至於青少年在不同年齡層是否憂鬱症狀發生的比例有不同呢？Tang, Tang, Ren, & Wong (2019) 的調查則發現青少年有憂鬱症狀的盛行率為 24.3%，且青少年年齡愈高時，其憂鬱症狀會顯著提高。台灣的調查研究則顯示，青少年從國一至國三有憂鬱症狀者約為 10%；從國一、國三、高二以至高三，憂鬱症狀的普遍情形分別為 62.3%、90.0%、89.5% 和 91.1% (賴慧敏等，2017)，顯示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隨年齡攀升的情形，而在國三及高三較高的原因，可能與那個時期經歷較大的課業和升學壓力有關。上述青少年不同年齡時期的憂鬱症狀統計是以整個團體平均數來看，顯示青少年整體而言憂鬱症狀隨年齡攀升。若以發展趨勢而言，則發現個別青少年在國一的憂鬱症狀起始分數無法預測國二和國三憂鬱症狀分數的高低，因此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趨勢有其個別性 (吳齊殷、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賴慧敏等，2017)。

綜合上述，可知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有其長期影響，即青少年時期的憂鬱症狀可預測成人早期的憂鬱症狀，青少年晚期的憂鬱症狀比青少年早期更能預測成人早期的憂鬱症狀。另一方面，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有可能是非線性的 (non-linear)，例如，青少年在一開始可能有較高的憂鬱症狀，隨後一年則降低，接着第三年有可能又攀升。

依附關係的定義和影響

青少年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包括與父母關係、與同儕關係、與學校關係，都是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情感連結關係。本研究將以依附理論出發，說明青少年與重要他人間情感連結對其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

內在運作模式

根據 Bowlby (1980) 的看法，他認為依附系統是人類促進生存的天生機制，當個體感受威脅或遭逢壓力 (例如生病、害怕、沮喪) 時，這個機制便會啟動，促使個體尋求依附對象的安慰和保護，以獲得安全感 (Cassidy, Stern, Mikulincer, Martin, & Shaver, 2018)。若依附對象能及時回應，個體就會獲得安全感；若依附對象不能及時回應甚至拒絕，個體就會產生不安全感。

與依附對象反覆的互動經驗使個體逐漸形成一套內在運作模式，包含對自己、對他人和對依附關係的看法。安全依附的人，其內在運作模式是正向的，相信自己值得受幫助和被愛，他人會幫助自己，相信依附關係是重要的；而不安全依附的個體，其內在運作模式是負向的，無法相信自己值得受幫助和被愛，不確定他人是否會幫助自己，並懷疑依附關係的重要性（Mikulincer & Shaver, 2016）。

情緒調節

內在運作模式不僅形成個體對自己與他人的看法，引導將來的人際互動模式，還會影響將來個體面對壓力時的情緒表現和調節情緒的能力，例如在壓力情境時，情緒反應是否適當，能否彈性調整情緒，不會局限於經驗特定情緒（Thompson, 1994）。

一般而言，安全依附的個體由於過去的好經驗，因此會以依附對象為平時的安全堡壘，壓力時的避風港（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並將其安全經驗內化，因此在壓力時，內化的安全感使他們更有能力調節自己的情緒，以健康方式因應壓力。不安全依附的個體因為過去的不安全經驗，難以視依附對象為安全堡壘或避風港，沒有安全的經驗內化，因此在壓力調節上會有困難（Mikulincer & Shaver, 2016; Waters et al., 2010）。

Mikulincer & Shaver (2016) 的研究發現，安全依附的人與不安全依附的人比較起來，前者較樂觀，面對壓力時較不會有災難式想法，對自己有信心，以更有建設性和有效的方式調整自己的情緒，因此面對情緒時較能開放、自由表達和調整自己情緒（Mikulincer & Shaver, 2016）。其他研究亦顯示，不安全依附個體的情緒調節能力較差，容易有憂鬱情形（Joormann & Gotlib, 2010; Murphy & Bates, 1997）。

綜合上述，依附經驗不僅影響個體對自己的看法，亦影響對他人的看法和將來的人際互動模式，是個體面對壓力和調節情緒能力的重要基礎，對個人心理健康有重要影響。

不同類型的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

青少年時期是學習在依賴父母與獨立自主間找到平衡的重要階段，因此雖然與父母的依附關係很重要，父母以外的社交接觸和情感交流亦對青少年邁向成熟是不可或缺的社會行為（Hinde, 1974）。於此轉換階段，青少年與學校、與同儕的關係顯得更加重要，透過與同儕的社交行為反饋和情感支持經驗的累積，發展出成人時期的社會行為（Allen & Tan, 2016; Zeifman & Hazan, 2008）。綜言之，父母、同儕與學校都是影響青少年身心發展的關鍵因素。以下分別說明青少年與父母、同儕和學校的依附關係對其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

父母依附

雖然青少年處於獨立與依賴的重要發展時期，與父母以外的同儕依附關係漸形重要，但與父母的關係並不因此而不重要（Allen & Land, 1999）。如依附理論所述，早期依附關係是個體人際關係的基石；Hirschi（1969）的社會控制理論說明當青少年與父母的聯結愈強，對父母的意見更加重視，愈不容易有偏差行為（譚子文、張楓明，2013b）。

在對憂鬱症狀的影響上，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愈緊密，憂鬱症狀的程度會隨之下降（Boutelle et al., 2009; Gomez-Baya, Mendoza, Camacho, & de Matos, 2018）。例如，在一項五年縱貫研究中發現，當青少年知覺父母關心他們、有困難時可以找父母時，則五年後的憂鬱症狀愈少（Boutelle et al., 2009）。另一項荷蘭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研究亦發現，當青少年知覺與母親關係愈親近（包括能與母親溝通、信任母親），以及知覺母親關心時，則兩年後的憂鬱症狀愈少（Branje et al., 2010）。其他研究都發現若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愈親密，其憂鬱症狀有下降趨勢，自殺念頭和行為愈少（Garber, Robinson, & Valentiner, 1997; Hammen, Brennan, & Shih, 2004）。

同儕依附

當青少年覺得受同儕接納，他們愈能接納自己，與同儕的依附關係愈安全；而與同儕的關係愈是安全依附，他們的情緒問題愈少（Millings, Buck, Montgomery, Spears, & Stallard, 2012）。相反，若青少年知覺與同儕的互動為負向甚至被拒絕，他們愈容易產生憂鬱症狀及其他心理困擾（吳治勳，2003；鄭雅心，2007；羅詩婷，2015；La Greca & Harrison, 2005；López & Dubois, 2005；Stice, Ragan, & Randall, 2004）。另一項研究亦顯示，當青少年與父母關係不良時，與同儕的關係便成為重要的保護因子，幫助他們在逆境時有較好的生活適應（Oldfield et al., 2016）。

學校依附

青少年的認同發展亦受學校環境影響。青少年平均一天花在學校的時間至少 9 小時，僅次於家庭，甚至有時還超過在家時間，因此青少年在學校的經驗對其身心的影響並不亞於從家庭而來的影響（Kasen, Johnson, & Cohen, 1990）。

學校對青少年的影響可從他們對學校的依附程度來談。青少年對學校的依附程度愈強，對學校愈有歸屬感（Ho, Schweitzer, & Khawaja, 2017; McEvoy & Welker, 2000）。對學校歸屬感愈強的青少年，愈能從學校依附關係中獲得幫助，減緩低落等情緒症狀（Kuperminc et al., 2001; Loukas & Robinson, 2004）。相反，若青少年對學校缺乏情感歸屬，就不太可能接受學校的關心和意見，學校亦難發揮情感功能，協助青少年紓解

情緒困擾（譚子文、張楓明，2013a）。由於青少年在學校的時間長，老師比父母有更多機會觀察青少年各方面的表現（包括情緒困擾），亦有機會做適時介入（Engels et al., 2016; Roeser, Midgley, & Urdan, 1996）。Hallinan（2008）指出，教師的支持（例如能否關心學生及一視同仁等），對學生是否喜愛學校和他們對學校的依附程度有密切關聯。

從上可知，要了解青少年的發展和生活適應，得考量環境脈絡因素對他們的影響，包括與父母、與同儕、與學校整體的依附關係。這三者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過去研究只會探討個別因素與青少年行為偏差或心理困擾的問題，尚未有研究同時探討三者對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發展的影響程度。台灣目前雖有吳齊殷、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以縱貫的資料探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趨勢與家庭、同儕、學校的關係，但綜合來說，這幾項研究並未同時討論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學校依附對憂鬱症狀長期發展的個別影響力。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青少年親子依附、學校依附和同儕依附關係，分析它們在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起始狀態和長期趨勢所扮演的角色，結合青少年所處環境脈絡的重要因子，了解它們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意義。

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取自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TYP 以多階層叢級抽樣方法，在台北市、新北市和宜蘭市三個縣市進行抽樣調查，第一層為縣市，第二層為鄉鎮市區，分層後以叢級抽樣在第二層中以學校和班級為抽樣單位，以當時國一學生（J1）與國三學生（J3）兩個世代為研究群體，進行長期的縱貫追蹤研究（伊慶春，2014）。據此，本研究以 2002 年國三學生為起始點，持續追蹤他們兩年後的憂鬱症狀發展情形，亦即是分析國三（第一波）、高一（第二波）、高二（第三波）的 TYP 縱貫資料樣本。有效填答人數為 2,690 人，男生 1,367 人（50.8%）、女生 1,297 人（48.2%），性別遺漏者 26 人（1.0%）。

測量變項

憂鬱症狀

TYP 中憂鬱症狀的測量是參考 Derogatis（1983）的症狀檢核量表修改版（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vised）。由於第一波（國三）、第二波（高二）和第三波（高二）的憂鬱症狀題目數不盡相同，為確保分析資料的一致性，本研究使用三波中

皆有測量的七題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測量題項。題目包括「鬱卒」、「頭痛」、「孤獨」、「失眠、不易入睡」、「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針刺」、「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和「感覺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等七題，請受訪青少年填答過去一星期中的憂鬱症狀程度，1分代表「沒有」，5分代表「有，非常嚴重」。此量表在三個測量時間上的信度 α 值為 .79、.74 與 .71。

依附關係

本研究參酌譚子文、張楓明（2013a）使用 TYP 測量青少年所知覺的依附關係為基礎，用作測量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的理論根據，原量表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選取題目，代表四個依附關係的構面。以下分別說明：

1. 父親依附——父親依附共六題，例如「會注意聽爸爸的看法或想法」、「以爸爸為榜樣」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七點量表，7分代表「總是」，1分代表「很不符合」，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與父親的依附關係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88。
2. 母親依附——母親依附共六題，例如「會注意聽媽媽的看法或想法」、「以媽媽為榜樣」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七點量表，7分代表「總是」，1分代表「很不符合」，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與母親的依附關係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86。
3. 同儕依附——同儕依附共四題，例如「我們班的同學相親相愛，猶如一家人」、「我不太喜歡與班上同學交往」（反向題）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四點量表，4分代表「很同意」，1分代表「很不同意」，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與同儕的依附關係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70。
4. 學校依附——學校依附共三題，例如「我以我的學校為榮」、「我喜歡學校」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四點量表，4分代表「很同意」，1分代表「很不同意」，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與學校的依附關係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67。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M）探討青少年國三至高二共計三年間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余民寧（2013）指出潛在成長模式是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的一種應用策略，可稱為全 y 模型，主要包含兩個潛在變項的估計：（1）截距（intercept），又稱為起始狀態（initial status），其參數設定上會將因素負荷量固定為 1，用以呈現初始階段時 y 變項的原始值；（2）

斜率 (slope)，又稱為成長速率 (rate of growth)，用以代表 y 變項在測量時間中的成長值，且各測量時間點上的因素負荷量可根據不同研究假設進行參數設定，用以反映或假設該測量變項在時間點上的變化軌跡。另外，由於縱貫資料容易面臨資料遺漏的問題，本研究使用完全訊息最大概似 (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 為遺漏值估計的方法。FIML 相較於各種刪除法和內插法有較高的估計效能、較低的誤差、較精確的模型拒絕率等優點 (余民寧, 2013; Enders & Bandalos, 2001)。

除了青少年憂鬱症狀為使用 LGCM 的分析方法，其他各依附關係則使用基本的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為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s)，用以探討各依附關係對於憂鬱症狀的意義。在模式適配度方面，本研究以 RMSEA (小於 .08)、CFI (大於 .90)、NFI (大於 .90)、IFI (大於 .90)、TLI (大於 .90) 為相關判別指標。使用 AMOS 21.0 和 SPSS 24 進行上述研究資料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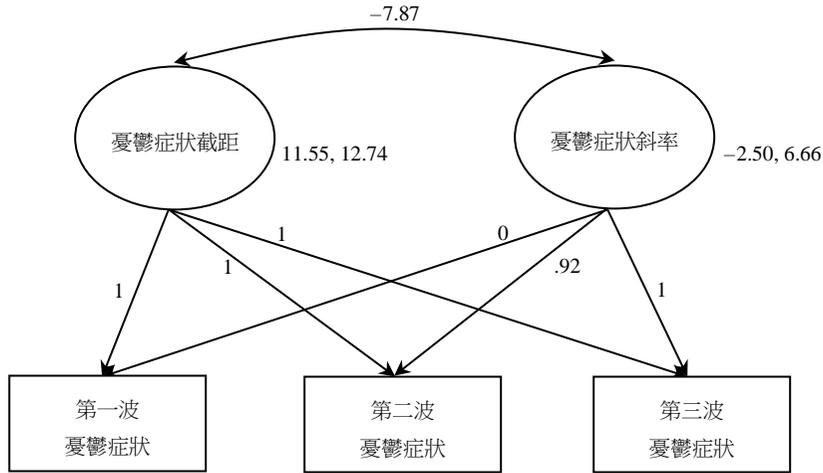
研究結果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潛在成長模式

為了解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變化，本研究以未指定軌跡模型 (unspecified trajectory model) 為潛在成長模式的斜率參數設定，亦即研究者不假設憂鬱症狀發展屬線性發展趨勢，僅設定斜率在第一個時間點和最後一個時間點的因素負荷量為 0 和 1，第二個時間點的因素負荷量則給予自由估計 (不設定)。未指定軌跡模型的意義是假定成長速率可能是一變動趨勢，無法由研究者事前決定其變化趨勢，需要由程式自由估計 (Meredith & Tisak, 1990)。在模式適配方面，本研究假設三個時間點 (三波) 的誤差變異數屬同質，亦即模式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 (余民寧, 2013)，LGCM 分析結果如圖一所示。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的誤差變異值為 4.99，達顯著水準 ($t = 41.268, p < .001$)，符合模式中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數和誤差變異達顯著的基本模式適配標準。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潛在成長模式整體模式適配情形如表一所示。雖然卡方考驗顯示不適配，但卡方值易受樣本數影響，故應參酌其他指標。本模式的 RMSEA = .071，小於 .08，屬良好適配；CFI = .97、NFI = .97、IFI = .97、TLI = .92，皆大於 .90，符合適配。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青少年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模式與觀察資料有不錯的適配情況，模式結果可用以探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變化。

表一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隨時間改變的具體情形。首先，由固定效果判斷，憂鬱症狀的截距平均數為 11.55，達顯著水準 ($p < .001$)；斜率平均數為 -2.50，達顯著水準 ($p < .001$)。這結果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平均起始值為 11.55，隨後在國三至高二期間的憂鬱症狀成長變化，是以每波平均減少 2.50 呈現逐年下降的情況。再者，

圖一：青少年憂鬱情緒發展軌跡的潛在成長模式（未標準化解）



表一：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模式的參數估計

	估計值	標準差	<i>t</i> 值
固定效果			
截距平均數	11.55	.08	141.41***
斜率平均數	-2.50	.08	30.43***
隨機效果			
截距變異數	12.74	.51	24.86***
斜率變異數	6.66	.53	12.59***
共變與相關			
共變數	-7.87	.45	17.39***
相關係數	-.86	—	—
斜率因素負荷量			
λ1 (第一波)	0		
λ2 (第二波)	.92	.02	43.13***
λ3 (第三波)	1		

*** $p < .001$

由隨機效果判斷，憂鬱症狀的截距變異數為 12.74，達顯著水準 ($p < .001$)；斜率變異數為 6.66，達顯著水準 ($p < .001$)。這結果代表青少年在國三的憂鬱症狀起始值即有顯著的個別差異，以及國三至高二期間的憂鬱症狀成長變化情形亦存在個別差異。

接着，由共變數與相關係數判斷，截距與斜率的共變數為 -7.87 ，且達顯著水準 ($p < .001$)，相關係數為 $-.86$ 。這結果顯示在國三時，憂鬱症狀程度較高的青少年，隨着時間發展，其整體的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慢；反之，國三時憂鬱症狀程度較低的青少年，在隨後的時間內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快。具體來說，這結果可能受極高效應 (ceiling effect) 所致，亦即原先憂鬱症狀程度較低者，有較高的憂鬱成長幅度，故國三時低憂鬱症狀的青少年在升上高中後，其憂鬱症狀成長速率會高於當時高憂鬱症狀的青少年。

最後，由斜率因素負荷量判斷，本研究以未指定軌跡模型使程式自由估計第二波 (高一) 的斜率，結果顯示三年的成長速率分別為 0 、 $.92$ 、 1 ，且第二波數值達顯著水準 ($p < .001$)。這結果代表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在第二波 (高一) 時急遽成長，持續上升至第三波 (高二)。

青少年的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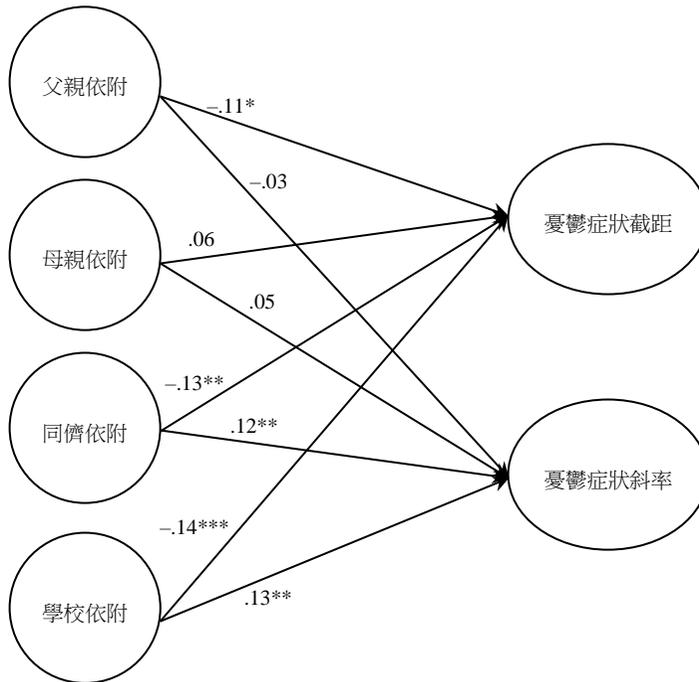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青少年知覺到的不同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關係，在潛在成長模式中加入預測變項，以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預測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截距和斜率，結果如圖二所示。

結果顯示，在青少年與父母親的依附關係上，父親依附對憂鬱症狀截距的結構係數為 $-.11$ ，達顯著水準 ($p < .05$)；父親依附對憂鬱症狀斜率的結構係數為 $-.03$ ，未達顯著水準 ($p > .05$)。顯示父親依附可降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但卻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沒有影響。母親依附對憂鬱症狀截距的結構係數為 $.06$ ，未達顯著水準 ($p > .05$)；母親依附對憂鬱症狀斜率的結構係數為 $.05$ ，未達顯著水準 ($p > .05$)。顯示母親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和成長速率皆無顯著影響。

另一方面，在青少年與同儕的依附關係上，同儕依附對憂鬱症狀截距的結構係數為 $-.13$ ，達顯著水準 ($p < .01$)；同儕依附對憂鬱症狀斜率的結構係數為 $.12$ ，達顯著水準 ($p < .01$)。顯示同儕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有負向影響，亦即同儕依附愈高者，其國三時的憂鬱症狀程度愈低。但是，同儕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卻有正向影響，代表國三時同儕依附程度愈高者，在進入高中直到高二為止，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較高。

最後，在青少年的學校依附上，學校依附對憂鬱症狀截距的結構係數為 $-.14$ ，達顯著水準 ($p < .001$)；學校依附對憂鬱症狀斜率的結構係數為 $.13$ ，達顯著水準 ($p < .01$)。顯示學校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有負向影響，亦即學校依附愈高者，其國三時的憂鬱症狀程度愈低。可是，學校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卻有正向影響，代表國三時學校依附程度愈高的青少年，日後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則較高。

圖二：青少年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結構模式（標準化解）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討論與建議

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概況

本研究以潛在成長模式分析青少年從國三至高二憂鬱症狀發展的起始狀態和長期變化軌跡，並探討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同儕依附、學校依附對其憂鬱症狀發展的趨勢影響。

在憂鬱症狀初始狀態上，研究結果顯現青少年憂鬱症狀有個別差異。在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上，憂鬱症狀發展有逐年下降趨勢，亦即國三時期憂鬱症狀程度最高，至高一、高二逐年遞減。究其原因應與國三正值會考準備時期，課業壓力最大，憂鬱症狀程度較高；進入高一，課業壓力減緩，但面臨轉換新學校適應期，因此憂鬱症狀程度次之；高二則已適應學校生活，因此憂鬱症狀程度下降。

青少年憂鬱症狀與父親依附、母親依附的關係

在父母親依附上，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三時期與父親依附關係愈好的青少年，其

憂鬱症狀程度愈低，而國三時期與母親依附關係的好壞卻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程度沒有關聯。

從國三至高二的憂鬱症狀發展趨勢上，父親依附與母親依附皆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長期趨勢沒有影響。這樣的結果部分證實親子依附關係良好對青少年的情緒健康有幫助，但僅限於父親依附在青少年國三起始狀態時期。可能的原因是國三時期青少年正值準備會考時期，學業是主要的壓力來源，而父親對孩子的幫助常與孩子的問題解決或生涯目標與成就有關（Cooper, 2009; Forehand, Long, Brody, & Fauber, 1986），因此本研究的發現可能與父親對孩子學業投入程度有關。至於與母親依附的結果，則與過去研究結果不一致。由於多數母親是家中主要照顧者，因此對孩子的生活起居照料和情緒照顧的機會比父親更多（Dubas & Gerris, 2002），因此過去研究大多得出青少年與母親的依附關係對他們的身心健康有影響，但本研究並未發現類似結果。可能原因是母親依附在青少年時期的影響力並不如想像般大，其他依附關係的重要性可能大於母親依附關係，亦即在納入父親依附、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後，母親依附的影響程度受到削弱，顯示在青少年時期，其他依附關係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程度有更明顯的影響。

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同儕依附、學校依附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同儕依附與學校依附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起始狀態和長期趨勢有顯著影響。在起始狀態部分，同儕和學校依附愈高的青少年，國三時期的憂鬱症狀愈少。在長期趨勢部分，青少年同儕或學校依附愈高者，其憂鬱症狀發展的長期趨勢反而愈嚴重。若將此結果與父母親依附結果結合來看，可見青少年階段學校和同儕的影響力勝過父母的影響力，符合青少年階段自我認同的重要來源是同儕認同和學校表現（Harter, 1993），突顯同儕和學校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程度。

這結果指出，原本在國中時期同儕、學校依附程度較高的青少年，在進入高中後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反而高於原先依附程度較低者，暗示青少年「依附關係」和「心理調適」的微妙互動。亦即是說，原先在國三階段時，同儕依附、學校依附程度較高的學生，在未來進入高中後，反而需要較多心理調適以因應原先國中時期已建立的高度依附關係，出現憂鬱症狀程度較高的負面心理狀態。

綜合來說，在各項依附關係中，以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對青少年憂鬱症狀較有影響力，能同時影響憂鬱症狀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而父親依附只能影響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母親依附則對憂鬱症狀沒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發現，父親依附、母親依附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關係不如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來得高，這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青少年在國中、高中轉銜時期，學校脈絡的影響程度可能高於家庭環境，亦即青少年的同儕關係和青少年對學校的整體感受，對

其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大於與父母親的依附關係，突顯出學校脈絡因子對於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性；其二，過去多數研究是以一個時間點上的橫斷面研究設計進行，探討依附關係與憂鬱、自尊或焦慮等心理健康的關係（陳金定、劉焜輝，2003；歐陽儀、吳麗娟、林世華，2006；譚子文、張楓明，2013a）。不過，本研究以縱貫式分析設計檢視依附關係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研究設計將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發展變化納入考量，分析結果更能掌握預測關係的解釋能力，於是與過往文獻結果有所不同。

對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建議

1. 本研究發現父親依附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影響，母親依附反而沒有影響，因此建議家長們（特別是父親）花更多時間陪伴青少年，了解他們生活中的壓力，適時給予情緒支持，提供因應策略，協助他們適應。另外，雖然母親依附在青少年這時期沒有顯著影響，母親依然扮演青少年情緒支持的重要角色，父母親可以學習與青少年互動時，在課業或人際上提供自身經驗，給予具體建議，使青少年有所依循，獲得實際幫助。
2. 在同儕依附方面，本研究發現同儕依附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顯著影響，因此建議父母能多鼓勵子女與朋友相處，增進孩子與朋友建立良好依附關係。父母亦能多與孩子討論人際交流技巧，提供建議。在學校方面，學校人員能多創造促進學生交流的活動，例如建立不同年級間的家族制度、辦理家族聚會，使學生有機會與其他交流，增進同儕依附。老師設計課程時，亦可以活動方式增進學生交流，例如採用小組合作競賽方式完成作業，使同組學生間產生連結、情感依附。輔導教師在輔導活動科時，可以在每堂課結束前設計小組談心時間，使同學有情感交流機會。其他如家政與童軍課程，可在設計課程中透過合作方式，提升互動與交流。
3.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學校依附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有影響，因此建議國中、高中單位創造友善、支持和安全的學校氣氛與歸屬，對學生秉持鼓勵、關心的態度，以增進學生對學校的依附關係。教師對待學生時以尊重為原則，時常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和生活適應，增加學生在班級上的認同，使學生感受到學校環境是值得信賴和投入的場域。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研究樣本是 2002 年至 2004 年的資料，距今已超過 15 年，因此研究結果或許不能完全代表當前台灣國三至高二的青少年。但 TYP 資料庫仍是台灣相當完整的

青少年縱貫發展的長期資料庫，因此其研究結果仍具一定代表性，可反映台灣青少年不同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長期發展的關聯。其次，本研究以縱貫方式探討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但還有其他重要的依附關係沒有納入討論，例如手足依附關係、家外成人依附關係，而這些依附關係可能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佔有相當角色，因此未來可以研究這些不同依附關係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程度。第三，本研究探討一般社區青少年樣本的憂鬱症狀表現，樣本數雖有代表性，但樣本來源只是一般青少年，而非臨床樣本，因此將來研究可納入青少年憂鬱症狀達臨床表現的樣本，比較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學校依附對一般樣本和臨床樣本的憂鬱症狀影響趨勢和程度。第四、本研究並未探討性別在不同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的差異，而過去研究發現，青少年中後期（15 至 18 歲）憂鬱症狀的程度有明顯差異（Hankin et al., 1998），因此後續研究可再檢驗性別差異，並深入了解男女憂鬱症狀差異的可能原因及預防方法。

參考文獻

- 王齡竟、陳毓文（2010）。〈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檢視同儕、專業與家外成人支持的緩衝作用〉。《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 23 卷第 1 期，頁 65–97。
doi: 10.30074/FJMH.201003_23(1).0003
- 伊慶春（2014）。〈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三波，青少年問卷（公共版）〉。擷取自 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925
- 余民寧（2013）。《縱貫性資料分析：LGM 的應用》。台北，台灣：心理出版社。
- 吳中勤（2015）。〈探究青少年憂鬱與偏差行為的歷時性的影響關係〉。《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第 32 期，頁 71–104。doi: 10.7038/JETP.201512_(32).0004
- 吳治勳（2003）。《青少年同儕關係的評估及其特性之探討——以憂鬱傾向與壓力歷程特性為指標》（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台北，台灣。
- 吳齊殷、黃鈺婷（2010）。〈青少年初期身心健康變化及其動態影響變因之討論〉。《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 23 卷第 4 期，頁 535–562。doi: 10.30074/FJMH.201012_23(4).0002
- 陳金定、劉焜輝（2003）。〈青少年依附行為與情緒調適能力之因果模式初探〉。《教育心理學報》，第 35 卷第 1 期，頁 39–57。doi: 10.6251/BEP.20030217
- 黃昱得（2014）。〈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多元風險因子：個別效果與累積效果的驗證〉。《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 27 卷第 3 期，頁 327–355。doi: 10.30074/FJMH.201409_27(3).0001
- 黃鈺婷（2011）。〈個人、家庭與學校脈絡中的影響變因與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軌跡之討論〉。《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第 29 期，頁 161–181。doi: 10.7082/CJGC.201104.0161
- 歐陽儀、吳麗娟、林世華（2006）。〈青少年依附關係、知覺父母言語管教、情緒穩定之相關研究〉。《教育心理學報》，第 37 卷第 4 期，頁 319–344。doi: 10.6251/BEP.20060213.2
- 鄭雅心（2007）。《探討國三青少年個人、家庭、學校因素對憂鬱情緒之影響》（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台灣。

- 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檳 (2017)。〈臺灣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之縱貫性研究〉。《教育心理學報》，第 48 卷第 3 期，頁 399–426。doi: 10.6251/BEP.20160308
- 羅詩婷 (2015)。《家庭結構、同儕支持、家庭關係對青少年憂鬱情緒之影響》(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台灣。
- 譚子文、張楓明 (2013a)。〈依附關係、低自我控制及接觸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係之研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第 21 卷第 4 期，頁 81–120。doi: 10.6151/CERQ.2013.2104.03
- 譚子文、張楓明 (2013b)。〈依附關係、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第 36 期，頁 67–90。
- Agerup, T., Lydersen, S., Wallander, J., & Sund, A. M. (2015).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course of depression betwee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46(4), 632–642. doi: 10.1007/s10578-014-0506-y
-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C., Waters, E., &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Allen, J. P., & Land, D. J. (1999). Attachment in adolescence. In J. Cassidy &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pp. 319–335).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Allen, J. P., & Tan, J. S. (2016). The multiple facets of attachment in adolescence. In J. Cassidy &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3rd ed., pp. 399–415).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Boutelle, K., Eisenberg, M. E., Gregory, M. L., & Neumark-Sztainer, D. (2009).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nectedness and adolescent emotional functioning over 5 year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6(4), 309–316. doi: 10.1016/j.jpsychores.2008.10.019
- Bowlby, J. (1980).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Branje, S. J. T., Hale, W. W., III, Frijns, T., & Meeus, W. H. J. (2010).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8(6), 751–763. doi:10.1007/s10802-010-9401-6
- Brière, F. N., Pascal, S., Dupere, V., & Janosz, M. (2013). School environmen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 multilevel longitudinal study. *Pediatrics*, 131(3), e702–e708. doi: 10.1542/peds.2012-2172
- Cassidy, J., Stern, J. A., Mikulincer, M., Martin, D. R., & Shaver, P. R. (2018). Influences on care for others: Attachment security, personal suffering, and similarity between helper and care recipi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4), 574–588. doi: 10.1177/0146167217746150
- Cohen, P., Cohen, J., & Brook, J. S. (1993).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disorders in lat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II. Persistence of disord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4(6), 869–877. doi: 10.1111/j.1469-7610.1993.tb01095.x

- Cooper, S. M. (2009). Associations between 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the academic engage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 girls: Self-esteem as a mediator?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35(4), 495–516. doi: 10.1177/0095798409339185
- Coyne, J. C. (1976). Depression and the response of oth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5(2), 186–193. doi: 10.1037/0021-843X.85.2.186
- Davaasambuu, S., Phillip, H., Ravindran, A., & Szatmari, P. (2019). A scoping review of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s for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uicide related behavior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55(6), 954–972. doi: 10.1007/s10597-019-00420-w
- Derogatis, L. R. (1983). *SCL-90-R: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procedures manual-II for the R(vised) version and other instruments of the psychopathology rating scale series*. Baltimore, MD: Clinical Psychometric Research.
- Dubas, J. S., & Gerris, J. R. M. (2002).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time parents spend in activities with their adolescent children as a function of child age, pubertal status and gende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6(4), 415–427. doi: 10.1037/0893-3200.16.4.415
- Enders, C. K., & Bandalos, D. L. (2001).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missing data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8(3), 430–457. doi: 10.1207/S15328007SEM0803_5
- Engels, M. C., Colpin, H., Van Leeuwen, K., Bijttebier, P., Van Den Noortgate, W., Claes, S., ... Verschueren, K. (2016). Behavioral engagement, peer status,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in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reciprocal influenc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6), 1192–1207. doi: 10.1007/s10964-016-0414-5
- Forehand, R., Long, N., Brody, G. H., & Fauber, R. (1986). Home predictors of young adolescents' school behavio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Child development*, 57(6), 1528–1533. doi: 10.2307/1130430
- Garber, J., Robinson, N. S., & Valentiner, D. (1997).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lf-worth as a mediator.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2(1), 12–33. doi.org/10.1177/0743554897121003
- Gomez-Baya, D., Mendoza, R., Camacho, I., & de Matos, M. G. (2018).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of perceived family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middle adolescence in Spai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9(7), 2037–2060. doi: 10.1177/0192513X17741174
- Hall, G. S. (1904). *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doi: 10.1037/10616-000
- Hallinan, M. T. (2008). Teacher influences on students' attachment to schoo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1(3), 271–283. doi: 10.1177/003804070808100303
- Hammen, C., Brennan, P. A., Shih, J. H. (2004). Family discord and stress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and other disorders in adolescent children of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women.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43(8), 994–1002. doi: 10.1097/01.chi.0000127588.57468.f6
- Hankin, B. L., Abramson, L. Y., Moffitt, T. E., Silva, P. A., McGee, R., & Angell, K. E. (1998).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from pre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Emerg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a 1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7(1), 128–140. doi: 10.1037/0021-843X.107.1.128
- Harrington, R. (2004).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depression in young people. In M. Power (Ed.), *Mood disorders: A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practice* (pp. 79–97).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Harter, S. (199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ow self-esteem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R. F. Baumeister (Ed.), *Self-esteem: The puzzle of low self-regard* (pp. 87–116).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 Hill, R., Pettit, J., Lewinsohn, P. M., Seeley, J. R., & Klein, D. N. (2014). Escalation to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mong adolescents with subthreshold depressive symptoms: Evidence of distinct subgroups at risk.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58, 133–138. doi: 10.1016/j.jad.2014.02.011
- Hinde, R. A. (1974). *Biological bases of human social behaviour*.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 N. K. N., Schweitzer, R. D., & Khawaja, N. G. (2017).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recently arrived Chinese adolescent migrants: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school belonging, and acculturative stress. *Journal of Psychologists and Counsellors in Schools*, 27(1), 24–36. doi: 10.1017/jgc.2016.4
- Joormann, J., & Gotlib, I. H. (2010).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 Relation to cognitive inhibi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2), 281–298. doi: 10.1080/02699930903407948
- Kasen, S., Johnson, J., & Cohen, P. (1990). The impact of school emotional climate on student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8(2), 165–177. doi: 10.1007/BF00910728
- Kobak, R., & Ferenz-Gillies, R. (1995).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adolescence: A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7(1), 183–192. doi: 10.1017/S0954579400006416
- Kobak, R., Sudler, N., & Gamble, W. (1991). Attachmen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adolescence: A developmental pathways analysi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4), 461–474. doi: 10.1017/S095457940000763X
- Kuperminc, G. P., Leadbeater, B. J., & Blatt, S. J. (2001). School social climat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vulnerability to psychopatholog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9(2), 141–159. doi: 10.1016/S0022-4405(01)00059-0
- La Greca, A. M., & Harrison, M. H. (2005).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 friendships,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Do they predict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4(1), 49–61. doi: 10.1207/s15374424jccp3401_5

- López, C., & Dubois, D. L. (2005). Peer victimization and rejection: Investigation of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effects on emotional, behavioral, and academic adjust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4*(1), 25–36. doi: 10.1207/s15374424jccp3401_3
- Loukas, A., & Robinson, S. (2004).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in early adolescent adjust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4*(2), 209–233. doi: 10.1111/j.1532-7795.2004.01402004.x
- McEvoy, A., & Welker, R. (2000). Antisocial behavior, academic failure, and school climate: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8*(3), 130–140. doi: 10.1177/106342660000800301
- Meredith, W., & Tisak, J. (1990). Latent curve analysis. *Psychometrika, 55*(1), 107–122. doi: 10.1007/BF02294746
-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16).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2nd ed.).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Millings, A., Buck, R., Montgomery, R., Spears, M., & Stallard, P. (2012). School connectedness, peer attachment, and self-esteem as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5*(4), 1061–1067. doi: 10.1016/j.adolescence.2012.02.015
- Murphy, B., & Bates, G. W. (1997).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nd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2*(6), 835–844. doi: 10.1016/S0191-8869(96)00277-2
- Musliner, K. L., Munk-Olsen, T., Eaton, W. W., & Zandi, P. P. (2016). Heterogeneity in long-term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Patterns, predictor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92*, 199–211. doi: 10.1016/j.jad.2015.12.030
- Oldfield, J., Humphrey, N., & Hebron, J. (2016). The role of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and school connectedness in predicting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outcomes.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21*(1), 21–29. doi: 10.1111/camh.12108
- Roeser, R. W., Midgley, C., & Urdan, T. C. (1996). Perceptions of the school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arly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functioning in school: The mediating role of goals and belong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8*(3), 408–422. doi: 10.1037/0022-0663.88.3.408
- Ssegonja, R., Alaie, I., Philipson, A., Hagberg, L., Sampaio, F., Möller, M., ... Feldman, I. (2019).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adolescence, recurrence in early adulthood, and healthcare usage in mid-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cost-of-illness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58*, 33–41. doi: 10.1016/j.jad.2019.07.077
- Stice, E., Ragan, J., & Randall, P. (2004). Prospectiv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Differential direction of effects for parent and peer support?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3*(1), 155–159. doi: 10.1037/0021-843X.113.1.155
- Tang, X., Tang, S., Ren, Z., & Wong, D. F. K. (2019).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in secondary school in mainland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45*, 498–507. doi: 10.1016/j.jad.2018.11.043

- Thompson, R. A. (1994). Emotion regulation: A theme in search of definition.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59(2–3), 25–52. doi.org/10.2307/1166137
- Waters, S. F., Virmani, E. A., Thompson, R. A., Meyer, S., Raikes, H. A., & Jochem, R. (2010).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ttachment: Unpacking two constructs and their association.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32(1), 37–47. doi: 10.1007/s10862-009-9163-z
- Wickrama, K. A. S., Conger, R. D., Lorenz, F. O., & Jung, T. (2008). Family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A life course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s*, 49(4), 468–483. doi: 10.1177/2F002214650804900407
- Zeifman, D., & Hazan, C. (2008). Pair bonds as attachments: Reevaluating the evidence. In J. Cassidy &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2nd ed., pp. 436–455).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Family and School Attachment Factors on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Tsung-Hsing LIU & Shou-Chun CH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a) establish model of the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ime with th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b) identify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on chang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Research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The participants were 2,690 9th, 10th and 11th grade students in three waves (2002, 2003, and 2004).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there w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initial status and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b) the changing rate of trajec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slower in adolescents of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at 9th grade compared to those of less severe symptoms at 9th grade; (c) there was an eleva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from 10th grade to 11th grade; (d) adolescents' attachment with peers and school were more influential than attachment with parents in regard to the initial status and changing trajectory of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 (e) father attachment only impacted the initial status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while mother attachment showe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the initial status and changing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vided.

Keywords: adolescent;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depression

LIU, Tsung-Hsing (劉宗幸)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CHIANG, Shou-Chun (江守峻) received his Master's degree from the MA Program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